

宋代的日曆和玉牒之研究

王 德 毅

一、前 言

現代學者研究歷史，一定要尋找原始材料，凡經後人輾轉鈔襲者，往往失掉真實性。我國自三代以來，歷代政府都很留心史實的紀錄和史書的編纂。春秋傳稱：「君舉必書，書而不法，後世何觀？」是以必求「書法不隱」，乃可垂訓後世。而能達成書法不隱者，乃是良史，必如晉之董狐，齊之南史方可。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史部正史類申論說：

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，以記言行，後世多務，其道彌繁。夏殷已上，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。周則太史、小史、內史、外史、御史，分掌其事，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。又春秋國語引周志、鄭書之說，推尋事迹，似當時記事，各有職司，後又合而撰之，總成書記。其後陵夷衰亂，史官放絕。秦滅先王之典，遺制莫存。¹

又史部終論說：

夫史官者，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，使居其位，百官衆職，咸所貳焉！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，天文地理無不察也，人事之紀無不達也。內掌八柄，以詔王治，外執六典，以逆官政。書美以彰善，記惡以垂戒，範圍神化，昭明令德，窮聖人之至蹟，詳一代之亹亹。

是自古無代無國無史，而史亦未嘗一日缺書，然必賴博聞強識、疏通知遠、安貧樂道之士爲史官，乃能善惡必書。歷代史官之權皆甚重。如漢代法律規定：太史公位在丞相上，天下計書，先上太史公，副上丞相。²唐武后時侍中韋安石嘗說：「世

1 古代天子諸侯皆有其國史，唐宋人蓋有一致的認識。汪藻浮溪集卷二「乞修日曆狀」云：「臣竊自古無國無史，史未嘗一日無書，晉謂之乘，楚謂之檮杌，魯謂之春秋，以此見無國無史也。春秋以事繫日，以日繫月，以月繫時，以時繫年，必四時具，謂之編年，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。」

2 見班固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、顏師古集注引漢儀注。

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，宰相但能制生人，史官兼制生死，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。」³ 唐代設館修史，宰相亦兼修撰，更任爲監修國史，其他朝官兼領史職者，稱爲史館修撰，新進的稱爲直史館。元和六年，宰相裴垕奏請：「登朝官入史館者並爲修撰，未登朝官入館者，並爲直館。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館事。」⁴ 其職責如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二「史館」條所載：

史官掌修國史，不虛美，不隱惡，直書其事。凡天地日月之祥，山川封域之分，昭穆繼代之序，禮樂師旅之事，誅賞廢興之政，皆本於起居注、時政記，以爲實錄，然後立編年之體，爲褒貶焉！既終，藏之於府。

自漢獻帝後，歷代帝王多有起居注，每季爲一卷，由起居郎掌之，唐貞觀二年置二員，移其職於門下省。責在「錄天子之言動法度，以修記事之史。凡記事之制，以事繫日，以日繫月，以月繫時，以時繫年。必書其朔日甲乙，以紀曆數，典禮文物，以考制度，遷拜旌賞以勸善，誅伐黜免以懲惡，季終則授之國史。」另有起居舍人二員，隸中書省，掌修記言之史，「錄天子之制誥德音，如記事之制，以記時政損益。季終則授之於國史。」⁵ 又新唐書卷四七百官志二「門下省」項載云：「凡官爵廢置，刑政損益，授之史官，既書，復泚其記注。」又載：「長壽中，宰相姚珣建議：伏下後，宰相一人，錄軍國政要，爲時政記，月送史館。」是唐代對於國史之修撰極爲重視，而設館修史制度亦堪稱全備，均頗爲宋代史官所樂道。如徽宗大觀三年起居郎石公弼所上「論復還史館之職」疏中直陳：

臣竊考唐正（貞）觀職官故事：天子御正衙，則起居郎居左、舍人居右，有命則臨陞俯聽，退而書之，每伏下議政事，亦必隨輔臣入殿，執筆記錄於前，史官隨之。及伏在紫宸內閣，則夾香案對立殿下，上記得失。由是事之機要，言之微密，人之忠邪，皆得書之方冊，昭示將來。明主賢臣之事，罔或缺遺，一代之典文，燦然大備。且唐天下垂三百年，號稱至治，莫盛於正觀，而謀猷設張，制度文采，勳績治效，必可垂法後世，而當時崇尚史官，載錄如此。由今考之，事之存者猶十之五六，此史官之不可不知故事也。⁶

此言貞觀中起居注所記政事堪稱完備。其後或因天子不躬親萬機，或因重臣意在弄權，起居注便少記機務，於一代政治得失之考求頗乏依據。然新唐書藝文志二仍著錄開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，亦甚驚人。至於時政記，則是若斷若續，其原因

3 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卷一一五朱敬則傳。又祝穆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四「作史」條引孫可之文云：「宰相升沉人於數十年間，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下，是史官與宰相分繫死生權也。」

4 見王溥唐會要卷六三「修史官」條。

5 見劉昫等撰舊唐書卷四三「門下省」與「中書省」兩項。

6 石公弼奏載趙汝愚諸臣奏議卷六十。

爲：「時政記使宰相爲之，賢者則推美避譽，邪臣則飾過隱非。事關機要，或疑謀泄而功沮；言及臣僚，或慮隙開而怨售；巧事形迹，互相依倚，銓次不廣，筆削自私，此時政記之在當時屢建而屢罷者此也。」⁷雖是如此，唐人在史書纂修上的諸多開創，仍爲宋人所肯定，章如愚的《羣書考索續集》卷十六「會要」條就說：

日曆始於唐，時政記始於唐，玉牒、實錄亦始於唐，史之有會要其亦自唐始乎？有唐會要，蘇冕創之，崔鉉續之，至於宋朝王溥而後成之，嗟呼，此一代之典耳！

唐人有了這些新的開創，宋人不僅都一一繼承，更加發揚光大，爲元明清三朝所不可企及。

唐代修日曆始於憲宗時，由監修國史韋執誼奏請，唐會要卷六三「修國史」條載云：

貞元元年⁸九月，監修國史宰臣韋執誼奏：伏以皇王大典，實存簡冊，施於千載，傳述不輕。竊見自頃以來，史臣所有修撰，皆於私家紀錄，其本不在館中，褒貶之間，恐傷獨見，編紀之際，或慮遺文。從前已來，有此乖闕，自今已後，伏望令修撰官各撰日曆，凡至月終，卽於館中都會詳定是非，使置姓名，同其封鎖。除已成實錄撰進宣下者，其餘見修日曆，並不得私家置本，仍請永爲常式。從之。

惟王應麟《玉海》卷四七「唐日曆」條則明言日曆始於蔣乂父子，時似在德宗時代。其所引爲新唐書卷一三二蔣乂傳云：「乂父將明，肅宗擢集賢殿學士。乂，貞元中（史館）修撰。子係，大中二年史館修撰；伸、偕亦修撰。傳曰：蔣氏三世踵修國史，世稱良筆。咸云：蔣氏日曆天下多藏焉！此日曆所從起也。」據史傳，乂自貞元九年（七九三年）擢右拾遺兼史館修撰，以後居史職凡二十年，卒年七十五。長子係，於太和二年（八二八年）任史館修撰，次子伸，大中二年（八四八年）亦任修撰。史未明言乂於何年始修日曆，要之與韋執誼之奏請相去不遠。其後修實錄，多以日曆爲據。如王溥《五代會要》卷十八「史館雜錄」條載：

7 此爲石公弼奏疏中語，同註六，又程俱《麟臺故事》（四部叢刊續編本）卷三「國史」條載元豐八年九月同修起居注王存奏，云：「古者左史記事，右史記言，唐正觀初，伏下議政事，起居郎執筆記於前，史官隨之。其後或修或廢，蓋時君克己勵精政事，則其職修，或庸臣擅權，務掩過惡，則其職廢，此理勢然也。」亦可有助說明。

8 國學基本叢書本唐會要作貞元元年九月，王應麟《玉海》卷四七「唐日曆」條，亦引會要，則云「永貞元年（八〇五年）九月壬申」，下注「憲宗初立」。案：據新唐書卷六十二宰相表二，韋執誼於貞元二十一年（卽永貞元年）二月辛亥爲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三月庚寅任中書侍郎，十一月壬申貶爲廣州司馬，則知永貞元年九月執誼正居相位，並任監修國史。至於貞元元年（七八五年），執誼尙未顯。

長興二年十一月四日，史館奏：當館昨爲大中已來迄於天祐，四朝實錄，尙未纂修，尋具奏聞，謹行購募。救命雖頒於數月，圖書未貢於一編，……竊恐歲月漸深，耳目不接，……伏念江表列藩，湘南奧壤，至於閩越，方屬勳賢，……固多羣士，富有奇書。其兩浙福建湖廣，伏乞特降詔旨，委各於本道採訪宣宗、懿宗、僖宗、昭宗以上四朝野史，及逐朝日曆，除目、銀臺事宜、內外制詞、百司沿革簿籍，不限卷數，據有者抄錄進上。若民間收得，或隱士撰成，卽令各列姓名，請議爵賞。從之。

唐憲宗以後，諸帝多有日曆，惟因中更喪亂，亡佚甚多。如舊唐書僖宗紀載黃巢據長安，及敗，縱火焚剽，復經亂兵縱焚，宮闕蕭條，史冊多不存。到昭宗大順二年（八九一年）詔修宣、懿、僖三宗實錄，監修國史杜讓能薦吏部侍郎柳玭及右補闕裴庭裕等五人共修之。時日曆記注或亡或缺，踰年而不能編一字，惟庭裕採宣宗朝耳目聞見，撰成東觀奏記三卷納於史館。⁹

五代時，戰禍相繼，然其時君臣亦頗留心修史與記注，如後唐明宗長興二年，史館奏請發付該館的文件，除時政記及起居注外，又有內庭逐日合書日曆，還請求「朝臣待制轉對公事逐人抄送當館，如有顯有頒行，逐司關報到者，旋據逐件一一於日曆收記。」此處所述之日曆頗似收文簿，僅略記事由，這是每日記錄的。而內庭日曆應是由樞密院所修。後晉趙瑩監修國史，請命端明殿學士或樞密直學士繫日編錄內庭公事；後周李穀監修國史，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件付史館；皆當屬內庭日曆一類。另外，瑩又請求「其百司公事，亦望逐季送館，旋要編修日曆。」穀亦上請「欲望以諮詢之事，裁制之規，別命近臣，旋具抄錄，每當修撰日曆，卽奉封送史館。」皆得允從。¹⁰在五代以前，修日曆是由史館負責的。

至於唐人所創修的玉牒，實源自漢代玉版圖簿，唐初立宗正屬簿，以親疏定爵級。代宗永泰中，柳芳編皇室新譜二十卷，恐亦只是列世系而已！至文宗開成三年（八三八年），李衢等修成皇唐玉牒一百五十卷，編年紀事如帝紀，始與史冊並驅。廣會要卷六五「宗正寺」門載：

太和二年六月，修玉牒官屯田郎中李衢等奏：竊以聖唐玉牒與史冊並驅，立號建名，期於不朽，伏乞付宰臣商量，於玉牒之上，特創嘉名，以光帝籍。

9 參見廣會要卷六十三「修國史」條及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二「雜史」類。

10 以上參考王欽若修冊府元龜卷五六〇「國史部記注」門，五代會要卷一八「史館雜錄」條，玉海卷四十八「記注」門。

勅旨：宜以皇唐玉牒爲名。¹¹

修玉牒由宗正寺負責，寺設有知圖譜官一人，修玉牒官一人分主其事。自開成三年李衢進呈皇唐玉牒後，始以玉牒名書，用以貧世繫分宗譜。章如愚《羣書考索續集》卷十六「玉牒」條云：

登封告成必用玉檢，法令明奧號爲玉條，天下之至堅而不可磨者玉也。史以玉牒名，其殆鋪張對天之閑休，揚厲無前之偉績乎！玉牒名書自唐開成始，上自帝繫，下及祥瑞，凡大制作、大除拜、咸書之，春秋之法，大事則書之策，或者其遺意歟！¹²

自後，玉牒成爲重要史籍。五代時，朝代更易太速，帝王宗支不廣，戰亂之餘，無意文事，至宋，而玉牒之修乃與日曆、聖政記、寶訓並重。

二、宋代史館與史官

宋代修史之制承襲唐代，而有若干改進。宋初設昭文館、史館、集賢院，是爲三館，通名之曰崇文院。程俱《麟臺故事》卷一「官聯」篇載制：

史館舊寓集賢院，監修國史以宰相充。開寶中，薛居正以參知政事監修，自後參知政事亦有管勾修國史者，不常置。景德中，又有同修國史之名，史畢卽停。修撰以朝官充，直館以京朝官充。又有檢討編修之名，不常置，掌修國史、日曆及典圖籍之事。判館事一人，以兩省五品以上充。後改官制，日曆隸國史案，每修前朝國史實錄，則別置國史實錄院。國史院以首相提舉，翰林學士以上爲修國史，餘侍從官爲同修國史，庶官爲編修官。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，從官爲修撰，餘官爲檢討。

同書卷三「國史」篇也載：

11 玉海卷五十一「唐玉牒」條，引唐會要，則云「開成二年（八三七年）六月，」並云：「開成後始置修玉牒官一人。」不知何以今傳本唐會要竟誤作太和二年（八二八年）？冊府元龜卷五六〇國史部譜牒門載：「李衢爲屯田郎中，文宗開成三年四月與巧王府長史林贊進所撰皇唐玉牒一百五十卷。四年爲大理少卿，又奉敕撰皇后譜牒。」舊唐書卷七十七下文宗紀下載：「開成三年四月癸丑（二十六日），屯田郎中李衢、巧王府長史林贊等，進所修皇唐玉牒一百五十卷。」與冊府合。查新唐書本紀不載，惟藝文志二「譜牒」類則載：「皇唐玉牒一百一十卷，開成二年，李衢、林贊撰。」與舊唐書頗不合。

12 高似孫《史略》卷三「玉牒」條云：「按：建武三十二年，梁從（松之訛）等奏求元封封禪故事，當用方石，再累置壇中，用玉牒書藏方石，牒厚五寸，長尺三寸，寬五寸，有玉檢，又用石檢十枚，列於石傍。以告曰：刻玉牒書函藏金櫃，壓印封之。又按：唐德宗元年有事岱宗，造三玉冊，皆以金線編玉牒爲之，刻玉填黃金爲字，又爲玉匱以藏，蓋太史公所曰：紬金匱石室之書者也。」故所謂玉牒，乃取其珍貴罕見之意，書之玉牒，則可以垂久遠。

國初直館分撰日曆，每季送史館，其後修撰官專之。太平興國八年監修李昉奏復唐時政記故事，每月送史館，題曰事件。端拱初改為時政記。二年，中書門下奏：每御前殿，樞密使先上，所有宣諭聖政嘉言，宰臣無由聞知，慮成漏落。遂詔樞密副史月錄附史事送中書編入。咸平五年，從鹽鐵使王嗣宗之請，三司奏事有可紀者，判使一人撰錄，逐季送館。大中祥符元年，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始別撰時政記。元豐官制既行，日曆歸祕書省國史案，專以著作佐郎修纂，別置國史院或實錄院，修先朝實錄國史，於是國史日曆分為二矣！

三館中之昭文館，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的修寫校讎之事，集賢院負責搜集典藏上項圖籍，皆無與於修史。史館既寄寓在集賢院內，亦重在收藏秘籍文獻，所以在遇到修國史實錄，修纂日曆時，另於門下省設編修院。元豐元年（一〇七八年）詔：「宣徽院等供報修注事，自今更不供起居院，直供編修院日曆所。」乃至四年，竟廢掉編修院，而將修纂國史日曆之事，返歸於史館，至於崇文院是創置於太平興國三年（九七八年）¹³，而三館均循唐之制，其最初所在乃後梁都汴以來之舊址。迨元豐五年（一〇八二年）更定官制，將崇文院改為祕書省，獨任撰述之事。宋會要輯稿職官十八「祕書省」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說：

祕書省……監掌書籍國史天文曆數之事，少監為之貳，而丞參領之。凡其屬有五！……開修時政起居注、修纂日曆。祭祀祝辭，則著作郎、佐郎主之；刊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祕閣經籍圖書，則祕書郎主之；編輯校定正其脫悞，則校書郎、正字主之；各以其職隸於長貳，惟日曆非編修官不預。

自後祕書省負責修日曆，由著作郎、佐郎任之。元豐六年三月有詔：「祕書省長貳毋得預修纂日曆事，進書奏狀即繫書，其關防弛漏並依舊編修院法。」八年八月，詔以吏部郎中曾肇，禮部郎中林希並兼著作郎。佐郎，不僅以史官難其人選，而著作亦屬清要之職。¹⁴元祐以後，日曆所之隸屬沿革，宋史卷一六四職官志四「日曆所」條言之甚悉。據云：

元祐五年，移國史案置局，專掌國史、實錄，編修日曆，以國史院為名，隸門下省，更不隸祕書省。紹聖二年，詔日曆還祕書省。宣和二年，詔罷在京修書諸局，惟祕書省日曆所係元豐國史案，除著作郎官專管修纂日曆之事無定員外，其分案編修日曆書庫官吏，並依元豐法。紹興元年，初修皇帝日曆

13 見李攸宋朝事實卷九及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八。

14 以上參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十八「祕書省」門，談臺故事卷一「官聯篇」。

，詔以修日曆所爲名，本省長貳通行修纂。三年，詔宰臣提舉，侍從官修撰。十一月，詔以修國史日曆所爲名。四年，詔以史館爲名。十年，詔依舊制併歸祕書省國史案，以著作郎、佐修纂，舊史館官罷歸元官。尋復詔以國史日曆所爲名，續併修神宗、哲宗寶訓。隆興元年，詔編類聖政所併歸日曆所，依舊宰臣提領，仍令日曆所吏充行遣。

國史日曆所既另負責編類聖政，自須增加工作人員，淳熙中，增添點檢文字一人，供檢文字一人，書庫官九人。十六年（一一八九年）二月，孝宗內禪，光宗卽位，詔國史日曆所編類至尊壽皇聖帝聖政，由監修國史提舉，更添置檢討官二員¹⁵。日曆所遂成爲常設機構。

至於玉牒之修，是宋朝君臣最重視的一件大事¹⁶，由宗正寺負責，同時還要編皇屬籍、宗藩慶系錄和仙源積慶圖。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「宗正寺」門引神宗正史志說：

宗正卿正四品，少卿從五品，丞從七品，主簿從八品，各一人；掌修纂牒譜圖籍之事。凡編年以紀帝系，而載其歷數，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，爲玉牒。序同姓之親，而第其五屬之戚疏者，爲屬籍。具其官爵功罪生死，及宗婦族姓與男若女者爲類譜。推其所自出，至於子孫，而列其名位者，爲宗藩慶系錄。考定世次枝分派別，而歸於本統者，爲仙源積慶圖。錄一歲，圖三歲，牒譜籍十歲，皆修纂以進。

宋自太宗至道元年（九九五年）仿唐制設置玉牒官，掌帝籍玉牒及皇族昭穆之序，旋任命史館修撰梁周翰修皇屬籍，久而未成，至眞宗咸平四年（一〇〇一年），宗正卿趙安仁始修成皇屬籍三十三卷。宋史卷二八七安仁傳說：「尋知兼宗正卿，……寺掌玉牒屬籍，梁周翰始創其制而未備，安仁重加詳定。又爲仙源積慶圖，皆統例精簡。」¹⁷乃詔於宗正寺建屬籍樓以藏之。大中祥符六年（一〇一三年），於宗正寺新址建玉牒殿，更皇屬籍名爲皇宋玉牒，九年，以知制誥劉筠爲修玉牒官。景祐

15 參見南宋館閣錄卷十及續錄卷一。

16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五，紹興十二年四月戊辰引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：「本朝國書殿奉寶藏，未有如玉牒者也。祖宗以來，用金花紅羅標黃金軸，至神宗朝，以軸太難以披閱，詔爲黃金梵夾，又以黃金爲匣，銷匙皆黃金也。進呈畢，安奉於宗正寺玉牒殿，士大夫罕有知其制度者。……國家宗室之繁自古無之，每朝爲一牒，宗室官稱名行、女與夫皆錄，以玉刊之，不亦難乎？」心傳案語說：「王鞏聞見錄稱，元祐大臣稱玉牒用玉刊如冊，正與此同。則玉牒體式士大夫不能知也久矣！然勝非所云每朝爲一牒，宗室官稱名行，女與夫皆錄之，此亦非是。每朝爲一牒，乃載人主系序及歷年行事，如帝紀而差詳，其後附以皇后事蹟。若親王宗室子女，則有宗藩慶系錄、仙源類譜、仙源積慶圖三書詳焉，非同爲玉牒也。玉牒則安於本（玉牒）殿，類譜等書則安於風箏堂。」

17 玉海卷五十一「新修屬籍」條云：「梁周翰創意爲之，頗有倫貫。」以是知安仁不能獨專其美。

元年（一〇三四年），修玉牒官李淑請以編修院廳西閣子充修纂玉牒之所¹⁸。於是修玉牒官亦多以史官兼領。元豐更定官制，宗正寺卿及少卿不再專用宗姓，遂將修纂玉牒之責，分隸於宗正寺官。紹興十一年（一一四一年）多始再建玉牒所，以宰相一人為提舉，以侍從一人為兼修玉牒官，以他官兼檢討官，凡宗正寺卿、少卿而下皆參與修纂，乃以宰相秦檜任提舉編修玉牒，起居舍人楊愿為兼修玉牒官¹⁹。二十九年，詔玉牒所併入宗正寺，不再設修玉牒官及檢討官，而以本寺少卿及丞同領編修之事，惟宰相之提舉則仍舊，但本寺主簿不參預修纂玉牒，却增添修書官一員以佐少卿。乾道元年（一一六五年），始以參知政事兼權提舉玉牒所，仍任命六部尚書、侍郎及中書門下兩省官兼任修玉牒官，而本司主簿亦預修纂²⁰。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六中所載劉季裴撰的「玉牒所題名記」說：

玉牒雖本唐制，至國朝始為詳備，蓋其藏書以殿，其領職以大臣，此非為寺（宗正寺）設也，為玉牒也。故寺事無巨細皆屬之宗正，而圖書之藏獨別而為玉牒所，示不敢輕如此！玉牒修書始於大中祥符六年，而尤備於政和、宣和之間，聞之諸老先生言：政和二年至五年，凡再進書，其典章文物雖三代不能過。於康盛矣哉！今所存者猶可詳其大概也。提舉一人或二人，必宰相若執政為之，宰執有軍國之務，率不過月一至焉，故必擇近臣一人為修書官，又許擇檢討官，以它局兼，或置或否。寺有卿，秩正四品，卿有少，秩五品，卿之屬有丞簿，凡此專為寺設也，而纂修皆預焉！

宋代重視修纂玉牒可以想見。

玉牒每十年進呈一次，實為頻繁，其敘事用春秋編年之法，務在「博而得其要，簡而周於事」。則修玉牒官非兼有史學史才史識三長者不可。從玉海卷五一所載玉牒凡例看來，可知內容包有禮樂政刑各方面，均關乎一代治亂。據云：

玉牒凡例：赦令、御札、聖旨、親筆處分、郊祀行幸、大臣拜罷、試賢良、大議論、更革廢置、大祥瑞災異、戶口增減，官雖卑因事賞罰關治體者。紹

18 事文類聚遺集卷五「修玉牒官」項云：「李淑言：前修玉牒官馮允亦是兼編修會要，蓋緣國史、玉牒事節須要照會，所以只就編修院修纂。」又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五十五「玉牒所」條亦作前修玉牒所官馮允，惟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「修玉牒官」門則作馮元。案：作馮元是，宋史卷二九四有傳。

19 參見事文類聚遺集卷五、玉海卷五十一及繫年要錄卷一四五，洪邁容齋隨筆卷五「史館玉牒所」條評云：「宗正寺修玉牒官亦然，（元豐）官制既行，其職歸於卿丞矣，而紹興中復差侍從為修牒，又以他官兼檢討，是與本寺為二也。」

20 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十「修玉牒官」及「玉牒所」兩門。如乾道三年工部侍郎薛良朋兼修玉牒官。他如五年吏部侍郎陳彌作、九年禮部尚書胡沂、淳熙十二年中書舍人王信（十三年除給事中）、紹熙三年吏部侍郎羅點，嘉定四年禮部尚書章穎，皆兼修玉牒官。又乾道五年十二月九日，宗正寺主簿林同乃與少卿胡裏及丞陸之望合奏修光堯玉牒事，則主簿亦預修纂可知。

興十二年奏請九事：一親祠天地宗廟，一皇子出閣公主下降，一宰臣除罷，一巡狩行幸，一大慶，一臨軒册后妃封皇子，一蕃國入貢，一大賞罰，一官雖小事係大體。

上述九事都是玉牒中要記載的，但因為修纂者並非人人皆精於史學，以致記事多不能盡如理想。同書同卷又載：

嘉定四年十月一日，修玉牒章穎等言：玉牒體制未定，凡例乖舛，蓋玉牒書一代大事，視遷固帝紀；而元降格目內分十條，若盡用帝紀之體則為太簡，然金匱寶匣藏於祕殿，若沿襲案牘之詞，登之簡策，似不雅正。至於事有當書而不書，有細事而累書，今欲定體制，開列某事當書，某事不當書，編成一冊，定為玉牒之凡例，官吏遵為成式，先後編集，不至異同。至非常之事，則自立言辭，鋪敘本末，隨事刪潤，以為成書。從之。

章穎的奏疏²¹中道出玉牒書法不一，且行文頗多俚語，應定共同遵行的凡例，然既能編成一冊，必是十分詳盡的，前引之玉牒凡例，想只是綱要了。

三、兩宋列朝日曆

宋太祖開寶七年（九七四年）閏十月，史館修撰扈蒙上奏說：「臣嘗讀唐書，見文宗每開延英，召大臣論事，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於殿堦螭頭之側以紀時政，故文宗一朝實錄稍為詳備。至後唐明宗，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，旋送史館。近世已來，此事都廢，每季雖有內庭日曆，樞密院抄錄付史館，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，帝王言動莫得而書。亦緣宰相以漏洩為虞，無因肯說，史官以疏遠見隔，何由得聞？徒虔著撰之心，難紀憂勤之德。伏望今後凡有裁制之事，優卹之恩，發自宸衷合書簡冊者，並委宰相及參知政事，每月輪次抄錄，送付史館，以憑修撰日曆。」²²詔從之。並命參知政事盧多遜專掌其事。並未能成書。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（九八三年）八月，直史館胡旦以自建隆以來日曆不備，希望「令樞密院仍舊置內庭日曆，委文臣任副使者與學士輪次記錄送史館。」帝採其建議，即詔「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，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，每季送史

21 章穎的奏疏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十「玉牒所」門，較詳盡，他列舉一些沿襲案牘文句、漏落大事而舉載細事的例子，可參考。

22 此奏收載在諸臣奏議卷六十中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五亦有節錄，文字稍有出入。

館。」²³太宗方欲興史職，於淳化五年（九九四年）四月因史館修撰張泌的奏請，乃徙置起居院於禁中，以史館修撰梁周翰掌起居郎事，直昭文館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。泌的奏疏甚切要，茲錄如下：

臣竊以史官之職掌修國史，不虛美不隱惡，凡天地日月之祥，山川封域之分，昭穆繼世之序，禮樂師旅之政，本於起居注，以爲實錄，然後立編年，示褒貶。伏觀聖朝編年謂之日曆，惟記報狀，略敘敕文，於聖政嘉言，皇猷美事，羣臣之忠邪善惡，庶務之沿革弛張，汗簡無聞，國經曷紀！謹案六曹故事，起居郎掌修記事之史，凡記事以事繫日，以日繫月，以月繫時，以時繫年，必書朔日甲乙以紀曆數，典禮文物以考制度，遷拜陞賞以勸善，誅罰黜免以懲惡，季終則授之國史。起居舍人掌修記言之史，錄天子制詔德音政事之制。臣欲請置起居院，修左右史之職，以記錄爲起居注，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，以備修日曆。如此則聖朝稽古必煥發於典墳，信史成文固度越於周漢矣！²⁴

日曆是據時政記與起居注修成的，故張泌請求設置起居院，修好起居注，將來修日曆、實錄就都有依憑了。修起居注的體式是由梁周翰進呈的，所請是：「今後應有崇德殿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，侍臣論列之事，依舊中書編爲時政記，月終送史館，自餘百官封拜除改沿革之事，並令關報起居院，以備編錄，每月送史館。仍命郎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，別爲起居注。每月先進御後付史館。」詔從之。起居注的進御自梁周翰等始²⁵。

眞宗景德四年（一〇〇七年）八月，詔修太祖太宗兩朝正史，以宰臣王旦爲監修，令知制誥朱巽與直史館張復同編排兩朝日曆、時政記、起居注，至大中祥符五年，始奏言：舊日曆於禮制止存事端，難以據之以修禮志，請就禮院取索建隆以來禮文損益、沿革、制作之事和論議詳定文字參照，²⁶可見修日曆時史官未能廣搜博採，其後，仍未能隨時纂輯。據長編卷九十八「乾興元年五月丁丑」條載：

23 參見長編卷二十四。按麟臺故事卷三「國史」篇，於胡旦之奏請繫雍熙四年（九八七年）九月，所登載的爲全文，未經刪節，是極難得的。其末云：「自今文武臣僚薨卒，望令御史臺告報家具行本狀碑文墓誌家諱贈錄送史館。……其閣門及通進銀臺司所進內外章疏合載簡策者，並乞送史館。如係中書及樞密院行違者，亦乞封下。自餘學士舍人院等合有關報文字，置籍檢補抄寫實封。外國朝貢委禮賓院逐旋申館。臣僚奏使諸蕃及行軍征討回日，許本館移文取問一行事狀及本國風俗。」得旨施行，並於史館門西廊屋另設修史院以修日曆，未幾撰成三卷進呈，後因胡旦改差知制誥，遂告停頓。

24 史館修撰張泌，麟臺故事卷三「國史」篇及華書考索前集卷十七「太宗置起居注」條均作張泌，案：泌於大中祥符八年（一〇一五年）始舉進士，距此時尚有二十一年，改作張泌非是。

25 參見玉海卷四十八「淳化崇政殿起居注」條。

26 參見麟臺故事卷三「國史」篇及長編卷七十八「大中祥符五年六月己未」條。

先朝（案：時仁宗已即位）日曆起居注未上者丞修纂之。蓋自大中祥符元年後史官失於選（撰）集故也。

既已下詔加緊纂修真宗朝日曆，乃權就宣徽院設編修院以修之。並任命集賢校理王舉正及館閣校勘李淑為編修官。及至慶曆中，張方平任史館修撰，專修自乾興至慶曆日曆，貢獻良多。王鞏撰方平行狀說：

仁宗臨御歲久，日曆因循失記，章丞相（得象）監修國史，奏公續修之。公始請自乾興迄慶曆臣僚之薨卒，悉追取其閔閔功狀，而已有門緒彫喪，或子孫不能紀其先世，遺落多矣，展轉究訪，僅可條次。至於諸司沿革事典，恐責送官，乃僅有存者。及仁宗在位四十二年，譔著實錄，賴公中間採集，稍有預備。²⁷

方平對文獻資料的廣搜博訪，有助於日後修纂仁宗實錄。但以史館修撰更易不常，修日曆工作受到影響，致積壓數年或十數年，難以追補。又以修日曆全據時政記和起居注，如記注過於簡略，則日曆便難盡詳。嘉祐四年（一〇五九年）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歐陽修在所上「論修日曆狀」中便指陳此一事實：

伏見國朝之史，以宰相監修，學士修撰，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，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，如此不為不重矣！然近年以來，員具而職廢。其所撰述，簡略遺漏，百不存一，至於事關大體者，皆沒而不書。……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，而不敢書所聞見故也。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，然聖君言動，有所宣諭，臣下奏議，事關得失者，皆不紀錄，惟書除目辭見之類。至於起居注亦然，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。修撰官祇據此銓次，繫以日月，謂之日曆而已！是以朝廷之事，史官雖欲書而不得也。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，今撰述既成，必錄本進呈，則事有諱避，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欲書也。加以日曆、時政記、起居注例皆承前，積滯相固，故纂錄常務追修累年前事，而歲月既遠，遺失莫存，至於事在今日可以詳於見聞者，又以追修積滯，不暇及之。²⁸

這些積弊如不及早革除，史官永遠無法舉職。修乃建請：（一）日曆、起居注等修好請進御，稍修史職。（二）准許史院隨時得據所聞見事之情實書之草卷，如確未有審者，得直牒諸司會問。標明月分，封存院中，候將來諸處供報齊足，互相參考，修為日曆。（三）嚴立程限，命監修的宰臣終年考核，對不稱職的史官予以責罰。（四）以前積年未修の日曆暫不追修，截自今後不得再積滯。中書、樞密院及內外諸司供報文件

²⁷ 見張方平《樂全集附錄》。

²⁸ 見歐陽修《歐陽文忠公集卷一〇八》，又見諸臣奏議卷六十。

如有遲滯，致妨修纂，請准許修撰官前往催請。上項建議，雖蒙允從，然史官的職權畢竟有限，事事請旨亦不勝其煩，積滯的情形仍不能避免。如監修國史韓琦於嘉祐八年（一〇六三年）八月（英宗已即位）所奏：「史院日曆未修者積十餘年，今將修先朝（仁宗）實錄，而日曆未備。……」²⁹時距歐陽修的奏請不過四年而已，顯見沒有多大改善。

神宗以後，新舊黨爭遂起，哲宗元祐年間，由舊黨人士執政，紹聖以後，則屬新黨餘孽專政時代，兩黨對神宗一朝變法所持觀點不一樣，這本是政治問題，却影響到纂修史書。宋會要輯稿運曆一「修日曆」門載：

紹聖元年九月十四日，翰林學士修國史蔡卞、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林希言：先帝日曆自熙寧二年正月已後至年終，係元祐中祕書省官孔武仲、黃庭堅、司馬康修纂。自熙寧四年已後至七年終，係范祖禹修纂。而黃庭堅、司馬康、范祖禹又皆係修先帝實錄官，其間所書正與昨修先帝實錄相為表裏，用意增損，多失事實。緣修國史院已得旨重修先帝實錄，所有昨來范祖禹等所進日曆，臣等乞一就詳改正，務盡事實，從之。

舊黨人士反對新法，於所修日曆實錄中，字裏行間表示不滿，或直書王安石的罪過。新黨則要為新法辯護，而蔡卞又是安石女婿，自然是以替安石脫罪為己任，兩者可能各有所偏，均欠公正。³⁰其後崇寧中蔡京監修哲宗實錄，大肆詆譏元祐之政，焚掉一些舊檔，以利其偽造歷史。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六「紹興四年五月庚申」條載臣僚論說：

元祐之政，乃是順人情、合公道，復祖宗之舊，成神宗之志也。其後章惇、蔡京、蔡卞之徒，積怨造謗，痛加誣詆，指白為黑，變是為非，邪正善惡，顛倒交錯，馴至危亂。在紹聖時，則取王安石日錄，用私書改修神宗實錄。在崇寧後，則焚毀時政記、日曆，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錄。其間所奏事端，悉出一時奸人之論，不可信於後也。……至於哲宗朝事迹，載在時政記、日曆者，皆為蔡京取旨焚毀滅迹。³¹

蔡京所奏焚的時政記、日曆，應是元祐舊臣所編修的，內中記載史實可能有不利於章惇、蔡京之處，京怕留下來會增加他的罪惡，乃在修好哲宗實錄之後，就奏請焚

29 見宋會要輯稿運曆一「修日曆」門。又玉海卷四十七「治平補日曆」條云：「四年六月癸酉，監修韓琦乞差實錄檢討陳繹同補未修日曆。」追補的情形仍然存在。

30 葉崇禮北海集卷二八「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又再申劃一劄子」云：「蔡卞……深詆元祐史官之非，其間言語不無過當失實。」又見繫年要錄卷七十六「紹興四年五月癸酉」條。

31 宋史卷三七六常同傳稱同嘗上疏論神哲二史，觀傳中摘錄文句，與要錄所載頗多相同，則知此處所云「論者」，應為常同。

毀了。職是，其間記事難免無根無據，不公不實。

宋室南渡以後，於日曆之纂修督責較勤，撰述亦較富，自高宗至寧宗皆修成日曆，卷帙甚鉅。紹興元年（一一三一年），因祕書少監程俱之請，始詔設修日曆所以備修今上皇帝日曆。時日曆自元符庚辰（一一〇〇年）至建炎己酉（一一二九年）三十年未修，翰林學士汪藻知湖州，請於郡政之暇，就本州所藏御筆詔令加以編集，以備修日曆官採擇。³²而祕書省正字陳祖言亦請修建炎以來日曆，均許之。丞相汪伯彥為高宗任大元帥時舊臣，負責編類元帥府及建炎中興事蹟，先後修成皇帝大元帥府事蹟十卷及建炎中興日曆五卷投進。三十二年（一一六二年）閏二月十九日，著作佐郎張震奏稱：「自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已成者五百九十卷，多所舛誤。而十二年以後迄今，所修未成書者至八百三十餘草卷。未立傳者七百七人，切慮日久益以廢弛，望令本監長貳同共修纂，正其差誤。內因故相所作時政記，所修者並審定事實，簽貼修改。」³³即蒙允從，但過了十年仍無定稿。直到孝宗淳熙三年（一一七六年），始由祕書監李燾編成太上皇帝日曆一千卷。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九四引燾自序說：「日曆起初潛，訖內禪，用春秋四繫之法，雜取左右史起居注，三省密院時政記，及百司移報，綜錯成章，凡關於時，靡不畢載。……」然高宗在位三十六年，所歷史官非一，即任監修國史之宰臣就有呂頤浩、朱勝非、趙鼎、張浚、秦檜、沈該、湯思退、陳康伯八人，其中秦檜獨任一十八年（自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），通考引中興藝文志說：「高宗日曆初年諸多為秦檜改棄，專政以後紀錄尤不足信。」權臣專政，粉飾太平，奪人之功以為己有，竄改歷史，偽造紀錄，自然不足為信了。

南宋除高宗日曆一千卷，據南宋館閣續錄卷四所著錄及宋會要輯稿職官十八「國史日曆所」條所記載，尚有：

一、今上（孝宗）皇帝日曆一千一百五十五卷——修自紹興三十二年（一一六二年）六月即位，至淳熙四年（一一七七年）終，淳熙六年三月修成進呈。

二、至尊壽皇聖帝（孝宗）日曆二千卷——接續前所修，自淳熙五年正月一日，至十六年二月內禪，光宗紹熙元年（一一九〇年）八月修成恭進。與前通為一書，總二千卷，卷各約五千字。

三、聖安壽仁太上（光宗）皇帝日曆三百卷——修自淳熙十六年（一一八九年）二月登極，至紹熙五年（一一九四年）七月禪位，寧宗慶元六年（一二〇〇年）二月修成投進。

32 見汪藻浮溪集卷二「乞修日曆狀」。

33 見玉海卷四十七「高宗日曆」條及繫年要錄卷一九八「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丙戌」條。

四、今上皇帝（寧宗）日曆一百一十卷——修自紹熙五年七月登極，至嘉泰元年（一二〇一年）十二月，嘉泰二年十一月修成進御。

五、重修今上皇帝（寧宗）日曆五百一十卷——前修成進御之一百一十卷日曆加以改正，並接續修撰至嘉定十二年（一二一九年）終，十四年五月修成進御。³⁴

有關理宗時代修日曆之情形，史書記載缺略，宋史全文卷三十三載淳祐二年（一二四二年）正月戊戌（初九日），右丞相史嵩之進呈寧宗皇帝玉牒、日曆、會要、實錄，未著錄卷數。宋史藝文志二「編年」類著錄理宗日曆二百九十二冊，足證宋末雖處在外患日益嚴重之秋，於日曆之纂修並未荒怠。

四、宋代諸帝玉牒

宋人纂修玉牒，始於太宗至道初編修皇屬籍。大中祥符六年二月，判宗正寺趙世長、趙可封「請於皇屬籍之上別崇懿號」，詔名「皇宋玉牒」。天禧元年（一〇一七年），宗正寺卿趙安仁負責重修玉牒屬籍，請以知制誥劉筠、夏竦、宋綬為修玉牒官，因為玉牒中要在逐年月中逐日記述國家大事，所以請求先向史館借國史本紀列傳鈔錄，鈔畢即封還，乃詔就史館鈔之。景祐元年（一〇三四年），知制誥李淑任宗正寺修玉牒官，於寶元二年（一〇三九年）修成皇帝玉牒二卷、皇子籍一卷。次年，修玉牒所請求自今歲始，列聖玉牒一年一次貼修，十年一次編錄。³⁵然仍有積欠失修情形，如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十「修玉牒官」門載：

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尚書省言：秉議郎宗正寺丞王鞏奏：宗正寺條例：皇帝玉牒十年一進，修玉牒官並以學士典領。玉牒自熙寧中翰林學士范鎮等一進之後，神宗玉牒至今未修。仙源類譜自翰林學士張方平慶曆年進書之後，徑五十年並無成書。自奉行官制，分隸宗正寺官，又復累年未果成。其神宗朝已上文字，臣近已進呈奉安。今合修纂皇帝玉牒類譜等，臣以十年進書之期尚遠，恐寺官因循，復成曠墜，請別立法：宗正寺修纂等書，其玉牒官每二年一具草繳進。……從之。

從王鞏奏中知他已修成神宗玉牒繳進，鞏為舊黨人士，蒙司馬光待之以國士，薦之於朝，擢宗正寺丞，豫修神宗玉牒，其政治立場與歷史觀點都和司馬光等一致。及蔡京當政，奏請重修神宗玉牒，崇寧三年（一一〇四年），命刑部尚書管師仁負責重修，並看詳哲宗玉牒，以求其記述的一致。

34 館閣續錄稱重修寧宗皇帝日曆五百卷，此從會要「國史日曆所」門及玉海卷四十七「嘉定日曆」條。

35 參見宋會要輯稿「修玉牒官」門及長編卷一二四。

宋人所修玉牒，正本安奉於宗正寺玉牒殿，副本藏於宮中，俾帝王聽政之暇便於省覽。政和八年（一一一八年），宗正卿閻丘籲奏：「祖宗以來，著衍盛大，玉牒簿止是二十一秩，不能盡載。今以宣祖後太祖、太宗、魏王三組編纂，至政和六年，太祖下九十九秩，太宗下二百六十九秩，魏王下一百四十八秩，乞付宗正寺。」從之。³⁶不幸在靖康之難時，因宦官鄧述提供情報，這些玉牒簿被金國元帥搜取到，按名單搜捕去宗室三千多人。³⁷渡江以後，宗正寺雖建，而有司失其所守，紹興二年（一一三二年）七月，少卿李易乃請補修，以便安奉，漸復北宋舊觀。紹興十二年（一一四二年），宗正丞邵大受以玉牒實與時政記、起居注相為表裏，獨缺不存，乃上奏說：「國朝宗寺舊掌之書有四：曰皇宋玉牒，曰仙源積慶圖，曰宗藩慶系錄，曰宗支屬籍。建炎南渡，四書逸於江澨，比命蒐訪闕遺，重加修纂，賜名總要，合圖錄屬籍三者而一之，而玉牒獨缺，望詔有司哀次，以正昭穆，以壯本支，備中興之盛典。」³⁸得旨允從，並命宰相秦檜董其事。故宗正寺玉牒所一方面要修今皇帝玉牒，還要補修北宋一祖八宗玉牒，約兩三年就要進書一次。如洪邁容齋隨筆卷五「史館玉牒所」條中所說：「又玉牒舊制每十年一進，謂甲子進書，甲戌甲申歲復然。今乃從建隆以來再行補修，每及十年則一進，故不過三二年輒一行賞，書局僭賞此最甚焉！」想必急於成書，難免會有草率不得體之失。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一列有自太祖至寧宗累朝玉牒，茲依其所述，參之宋會要修玉牒官及玉牒所兩

36 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「修玉牒官」門。

37 宋會要輯稿卷二「建炎元年二月癸酉」條李心傳案語說：「實錄云：『二月癸酉，舍人於宗正寺取玉牒簿，指名取南班宗室，自二王宮，以近屬及官位高者先取。』而中興會要乃云：『宗藩慶系錄、仙源積慶圖等四書，皆於初渡江時失之。』則是玉牒果為所留也。」又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一引中興遺史說：「內侍鄧述者，太上梓臣也。置在軍前，至是黏罕、幹離不懷廢立之意，尤令鄧述將太上兒女供其數，……後吳玠持廢立文字，要太上諸王以下，孫傳意欲藏匿，吳並持文以示，乃鄧述與管宮閣內侍先已具其數，已各書姓名以示之，傳乃吞聲而盡發焉！又金人於宗正黃少卿處取玉牒簿去，指名要南班宗室，先自二王宮、濮王宮，以近屬官序高者先取。宗室逃竄於細民家藏匿，徐秉田為金人所逼，押文引令諸使臣收捉。」案：此處所言宗正黃少卿，據要錄知為黃哲。金人所以這樣做，乃因鄧述提供了相關情報，當無可疑。

38 見玉海卷五十一「紹興仙源慶系」條。案：宗正丞邵大經，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「修玉牒官」門作「邵大經」，此從要錄及玉海，並參洪适代撰之皇宋玉牒序。适代撰序文，載盤洲文集卷二十五。有云：「宋有天下，傳序相授，於今十帝，枝胄扶疎，瓜瓞綿衍。自至道中始修玉牒，掌帝籍皇族昭穆之序，仍命刑部郎臣伯編屬籍書。至咸平中，臣安易修成屬籍三十卷。祥符中，臣世長言：唐李膺以玉牒與史冊並驅，因名皇唐玉牒，遂詔以皇宋玉牒為名，且建堂于寺，而仙源積慶圖、宗藩慶緒錄，則每歲元日獻而納諸龍圖天章寶文閣。建炎之役，舉不復有，皇帝中興，益嚴家法，以化天下，凝旒岩廊，慨然以天枝玉葉蕩無紀錄，乃博求而總輯之，俯從議臣之請，而四書復備，甚盛德也。臣切惟我宋之治，敦崇宗明，親賢並建，……驅漢駕唐，而七國八王驕奢湛佚之患寂未之有，璇源著衍，既有圖鑑，而雍睦之政，嘉言懿範，與夫宗英事業，可以鳴徽無窮，尚闕而未著，是書之成，可謂備矣！」

門所載，列述如下：

一、太祖玉牒——紹興二十七年（一一五七年）四月，宰臣沈該上太祖玉牒，登進於垂拱殿，藏於玉牒殿。

二、太宗、真宗玉牒——乾道三年（一一六七年）林邵言：「太宗朝已成，真宗至欽宗七世未加一筆。」五月，上太宗玉牒，淳熙元年（一一七四年）十二月，復進真宗玉牒四十卷。³⁹

三、仁宗、英宗玉牒——仁宗玉牒計分四次投進，為淳熙四年三月、五年十月、七年四月及十三年十一月。仁宗玉牒第三次進呈後，修玉牒官王希請并修英宗玉牒。十三年十月，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王信言：「本所恭修仁宗皇帝玉牒，自皇祐四年至嘉祐八年，已成一朝；并英宗一朝玉牒及三祖下第六世宗藩慶系錄已成書，未經進呈。」次月，兩朝玉牒同時繳進。

四、神宗、哲宗玉牒——神宗玉牒八十卷，慶元三年（一一九七年）二月投進。先是，紹興七年汪藻、鮑延祖編哲宗玉牒上之。淳熙五年（一一七八年）八月，宗正簿胡南逢言：藻失紀事之體。詔重修之。七年四月修成進御。

五、徽宗、欽宗玉牒——徽宗玉牒第一次修成進御於淳熙四年（一一七七年）三月，至寧宗嘉泰三年（一二〇三年）四月，又上一百二十卷。開禧元年（一二〇五年）閏八月，平章軍國事韓侂胄上欽宗玉牒二十冊（卷）。

六、高宗玉牒——紹興二十七年四月始上今上皇帝玉牒。乾道六年（一一七〇年）五月再進，九年七月，修玉牒官胡沂言：「本所見修玉牒，今已恭修光堯壽聖太上皇帝玉牒成書。」於九月進呈。時高宗尚為太上皇。

七、孝宗玉牒——乾道九年八月始進今上玉牒，淳熙四年三月再進。光宗紹熙元年（一一九〇年）八月進呈壽皇聖帝太上皇帝玉牒，三年四月，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羅點言：「本所接續修纂至尊壽皇皇帝玉牒，係自淳熙十年以後，至十六年二月一日，將已成書。……」至十一月修成投進。

八、光宗玉牒——慶元六年二月進呈聖安壽仁太上皇帝玉牒四十卷。嘉定初有詔看詳重修，十三年五月，由監修宰臣史彌遠投進，名為光宗玉牒。

九、寧宗玉牒——嘉泰四年八月丞相陳自强進呈今上皇帝玉牒五十卷，嘉定六

39 據宋史全文卷二十四所載，宗正丞林邵曾自修真宗玉牒四十卷。乾道元年五月，邵奏：「祖宗玉牒，昨緣南渡，散失不存，前後修纂惟太祖一朝事蹟已經安奉，太宗玉牒雖已成書，尚未進入，太上今上玉牒目今見修，自真宗至欽宗凡七世，並未下筆。緣近來體例，每修一朝玉牒，必取旨開局，方始修纂，十年方許一進，則是列聖之書，雖百年而未備。臣今自修真宗玉牒十年，計四十卷、望令本所日下繕寫，同仙源積慶圖進呈，降下玉牒殿安奉。」從之。是真宗玉牒本是林邵一人力量修成，但只修十年，計真宗在位共二十五年，邵所修者不及一半。淳熙初所投進者乃屬一朝。

年閏九月，監修史彌遠上刊正辨誣之書，理宗淳祐二年（一二四二年）右丞相史嵩之進呈寧宗玉牒。

宋代帝王玉牒，於卷末必附載后德始末，以彰母道，以示配天作合。如紹熙元年三月宗正少卿耿秉奏：「本所見修今上皇帝（光宗）玉牒；合要皇后家世三代名銜，並始生年月日時行第及符瑞，初封并節次加封年月日等事跡照應編修。」⁴⁰就是最好例證。再如高宗吳皇后凡歷四朝，寧宗之立，即由后主張，宗正寺主簿常楮請求下詔玉牒所編其聖德事跡，附於高宗玉牒之末。開禧元年閏八月編成憲聖慈烈皇后聖德事跡一十卷上進。

玉牒既是史書之一，監修者如為權奸佞臣，往往逞其私志，或彰其功伐，或變亂是非，如秦檜提舉編修今上（高宗）玉牒時，修玉牒官楊愿請載檜於靖康二年（建炎元年，一一二七年）初推戴趙氏事蹟，檜即加撰錄進呈，旋降付該所，及王曦任玉牒所檢討官，備載檜功勳，極盡誇張之能事。宋史全文卷二十一有載：

紹興二十年夏四月己未，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討官王曦言：本所見修玉牒，竊見靖康二年太師秦檜入狀軍前，乞存趙氏社稷，兼在軍前與莫儔爭辨，以全家保天族，並在中京代上皇作書與國相，建明和議籌大節，並已修入玉牒外，所有元降下推戴事迹乞備錄全文關送國史日曆所照應施行。從之。

五月甲辰，秘書少監湯思退言：近玉牒所關到太師秦檜推戴趙氏事蹟，竊意師臣謙不伐功，特以事于玉牒姑具大概，其餘間關執節之久，本末未能備盡，望令檜詳錄奏聞，宣付史館。上謂檜曰：可依所奏。檜謙退久之。上曰：

不然，無以使後代知卿忠義。

此乃修玉牒、修日曆之臣僚迎合秦檜，檜亦厚顏掠美要功，以誑當時及後世，朱希祖偽楚錄輯補引大金弔伐錄，辨之甚明。⁴¹再如韓侂胄所主持編修的寧宗初年玉牒，述寧宗之立，便有專功掠美之處。

真德秀西山集卷四十四「譙殿撰（令憲）墓誌銘」說：

嘉定元年遷宗正少卿兼史職。初侂胄專朝權，自謂上之立有定策功，史官爭承迎，書初元事皆失實，公前因對請刊正誣史，及是又言：玉牒記大政，而內禪一節顯歸功權臣，非所以視萬世，臣謹條其繆妄，隨事辨正，名曰「甲寅玉牒辨誣」。願下本所命官考詳釐正，從之。

譙令憲的請求是在嘉定元年（一二〇八年），次年四月，真德秀為校書郎，上殿奏

40 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「玉牒所」門。

41 除朱希祖偽楚錄輯補已辨者外，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五「大金弔伐錄」條，亦考證得知弔伐錄所載檜狀獨得其真，會編、要錄等書所載是檜更易後奏進的，時人皆為其所愚。

事，極論奸臣主修史，動涉誣罔。其奏劄說：

臣伏見近者諫臣抗章論及史事，明詔亟俞其請，蓋將勒成大典，以示方來，非小補也。臣以非材備數文館，玉牒會要皆預討論，敢緣所職，妄有陳述。臣恭惟陛下賢聖仁孝自昔著聞，甲寅之秋肇獲大位，蓋出於光宗付託之誠，憲聖擁佑之力，而大臣實奉行之，授受之間粲然明白，秉史筆者，固宜鋪張其實，以詔萬世。而臣伏觀玉牒會要所書大抵承迎侂冑之意，而夸大其功，欺天罔人，莫此為甚。昔紹聖中奸臣用事，被宣仁以奪嫡之謗，以蔡確以定策之名，顛倒是非，終危社稷。今陛下窮膺祖宗神器之重，而簡冊所記顯歸功一賓贊之小臣，傳之萬世，何以爲法？……臣側聞嘉定元年二月議臣有請，命史官取紹熙五年以後至開禧三年以前史館文字并日曆時政記，凡涉誣罔，悉行改正。陛下既俞之矣，歷時浸久，必已成書。臣願特降睿旨，命國史實錄院具所修事節上之朝廷，看詳允當，卽頒下玉牒會要所參照重行修纂，上以光聖朝揖遜之美，下以杜奸黨窺覷之漸，天下幸甚！⁴²

即前述的憲聖慈烈皇后聖德事跡亦在刊正之列，蓋其時史彌遠方任宰相，專權日甚，極不滿於韓侂冑，凡醜化侂冑者無所不爲，在史的領導和指示下，寧宗玉牒辨誣和憲聖皇后事跡刊正，皆先後完成。實則彌遠之專政並不下於韓侂冑，且曾於寧宗崩後，矯詔廢皇子濟王竑，更立理宗，其不臣之心，灼然可見，然其黨鄭清之及其姪史嵩之先後監修國史，竟在寧宗紀及理宗玉牒中，於毒殺濟王一事隱而不書，遂使一代之史盡成曲筆了。⁴³

五、結 論

我國傳統史學發展到宋代，大致已經定型，各種史書相繼編著而成，有因襲前代所創史體而繼爲之者，有開創新史體以啓後代者。亦有雖承前規，而却能推陳生新者。如日曆、玉牒之纂修雖承唐代遺規，然纂修之勤，記事之詳，則遠過之。宋代官修史書，其要者則如山堂考索續集卷十六「修撰」條所說：「史之目不一，而其凡有二：曰紀載之史，曰纂修之史。時政有記，起居有注，其紀載之史乎？纂修

⁴² 見同上書卷二「己巳四月上殿奏劄二」。

⁴³ 宋史卷四〇九高斯得傳云：「李心傳方修四朝史，辟爲史館檢閱。……斯得分修光、寧二帝紀，尋遷史館校勘。……時丞相史嵩之柄國，……淳祐二年，四朝帝紀書成，上之，嵩之妄加毀譽於理宗、濟王，改斯得所草寧宗紀末卷，斯得與史官杜範、王遂辨之，範報書亦有奸人勸入邪說之語，然書已登進矣。心傳藏斯得所草，題其末曰『前史官高某撰』而已！」權臣欲掩其罪惡，就利用監修國史之職權，於史書加入一些有利於他的文字，而對政敵大加詆誣。

之史，名目滋多，實錄云者，左氏體也，正史云者，司馬體也。紀其大事，則有玉牒，書其盛美，則有聖政，總其樞轄，則有會要。其曰日曆，合記注而編次之也。其曰實訓，於實錄正史之外而撰定之也。其爲書也詳，其爲職也重，任是責者，豈容以易爲哉？」⁴⁴ 這些史書的纂修，常需數年或十數年，甚至要重修或三修，亡佚了還要補修，宋朝廷在修國史上所投注的人力物力，是難以計算的。

宋代修史的史官多是兼任的，一部史書由衆人分修，往往不相統攝，造成很多弊病，誠如朱熹所論：「今之史官全無統攝，每人各分一年去做，或有一件事，頭在第一年，末梢又在第二三年者，史官只任分年去做，及至把來，全闕湊不着。」又說：「今雖有那日曆，然皆是兼官，無暇來修得。……如近時作高宗實錄，却是教人管一年，這也不得，且如這一事頭在去年，尾在今年，那書頭底不知尾，書尾底不知頭，却不成文字。如爲臣下作傳，某將來看時，說得詳底只是寫行狀，其略底又恰如春秋樣，更無本末可考。又有除差去了底，這一截，又只休了，如何地稽考？」⁴⁵ 這是熹所親見的，他曾建議史院分事修，一人負責一事，把全國事分爲吏兵刑工戶禮六類，並建議史官必須專任，但都未被採納。有的修書官缺乏敬業精神，等快到繳進時限了，再臨時趕工，鈔輯檔案了事。如真德秀西山集卷四十七「袁公（燮）行狀」所載事例：

公之在宗正也，修寧宗玉牒，在樞府修經武要略。先時修書官類不經意，將進，則取具臨時。公涖職，卽悉力編摩，後數歲乃進呈，大要多出公筆。當然稱職盡責的史官仍不在少數，宋代著名的史學家，如歐陽修、宋敏求、范祖禹、李燾、洪邁、李心傳等，或主修玉牒，或豫修日曆，或專修實錄，或同修國史，都是卓有貢獻的，宋代玉牒，今存的只有寧宗玉牒初草二卷，爲劉克莊所修，收在後村大全集中，⁴⁶ 用四繫之法，記言記動，詳載嘉定十一、十二兩年大事，較之宋史寧宗紀詳備甚多。至於宋代日曆，今雖無存者，然汪藻所修靖康要錄十六卷，實是日曆之體，當洪邁主修欽宗實錄時，史館曾將此書移送到實錄院，⁴⁷ 可見這是修實錄的重要參據史料。

44 陳傅良止齋文集卷四十「嘉邸進讀藝祖通鑑節略序」說：「本朝國書，有日曆，有實錄，有正史，有會要，有勅令，有御集，又有百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，三朝以上又有實訓，而百家小說私史與士大夫行狀誌銘之類，不可勝紀。自李燾作續通鑑（長編），起建隆元年，盡靖康元年，而一代之書萃見於此，可謂備矣！」宋代史籍極稱浩瀚，卽今所存的宋會要輯稿，內容比唐五代會要豐富多了。

45 見朱熹朱子語類卷一〇七。

46 寧宗玉牒初草，另收在藕香零拾中，繆荃孫跋，盛讚此爲宋實錄之式，猶有左右史之遺意。

47 參考拙撰「靖康要錄及其作者考」，收在宋史研究論集第二輯，民國六十一年鼎文書局出版。